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6.004

李大陆:“威胁认知与执行激励:越南强化海上力量的双重动因”,《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6期,第43-56页。

LI Dalu, “The Cognition of Threat and Incentives in Execution: Dual Motivations for Vietnam to Strengthen Sea Power”,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6, 2018, pp.43-56.

威胁认知与执行激励:越南强化 海上力量的双重动因

李大陆¹

(1.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 目前对冷战后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动因的分析并不全面。需要结合认知与执行两个层次的因素进行更充分地解释。从认知层面来看,中越之间的历史记忆强化了越南的威胁认知,推动越南诉诸扩张海上力量来制衡中国。从执行中产生的激励效应来看,越南海上力量可以在执法冲突或有限武装冲突中发挥威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国的南海维权。与此同时,越南海上力量发展也受到国际环境的激励,美国的支持和中国的克制政策,导致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在受到地缘政治环境正反馈的同时,避免了经济发展环境出现消极反馈,为越南扩张海上力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 海上力量;历史记忆;越南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8)06-0043-14

在南海争端中,加强海上力量建设是东南亚相关争端国对中国实施硬制衡的基本方式。这里的海上力量是指可用于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各种军事和准军事力量的总称,其主体即为海军。在东南亚五个争端国中,文莱因为综合国力的限制,从未有过重要的军事发展计划,海军总体规模和装备水平较为落后。菲律宾尽管在南海争端中较为激进,但海军发展却近乎停滞。相比之下,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上力量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越南的发展最为迅速。事实上,越南海上力量在规模和技术水平

上的快速提升极其罕见,甚至很难再从海军史上找到一个发展中小国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发展现代化的海上力量。至少在中国以外的东亚历史中,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行的首轮海军扩张可与之相比。那么,越南建设海上力量有何动因?目前的解释有何不足?如何构建一个认识越南海上力量快速发展的理论框架?解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试图从认知和执行两个层次的因素构建解释模式,将越南的威胁认知、海军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国际环境的反馈结合起来,解释越南海上力

收稿日期:2017-04-25;修订日期:2018-05-0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冷战后东南亚南海争端国‘对冲战略’比较研究”(17YJJCJW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大陆(1984—),男,山东烟台人,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军事教学部讲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双聘研究员,上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权与国际安全。

量快速扩张的内在机理。

一、研究回顾及本文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海上力量建设,其涉及的关键问题主要是海上力量的发展现状、模式及主要动因。具体到越南的案例中,首先是对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现状的分析。在承认越南海军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学界对越南海上力量能否形成有效的威慑能力尚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越南海军在 C4ISR 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上的短板以及训练、作战经验上的不足使其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能力。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越南海军的装备水平和地理优势将使其有能力应对低烈度冲突,这将对中国的南海维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① 作为一种小国抗衡大国的“不对称”武器,越南潜艇的发展也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麦卡弗里(Jack McCaffrie)在研究中指出,东南亚潜艇将主要用来执行海洋拒止任务,越南潜艇的发展将使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化。^② 安德森(Jan Joel Anderson)的研究则表明,越南很难实现水下常规威慑,维持潜艇力量的成本远远超过越南的预期。^③

关于越南海上力量扩张的模式。杰弗里·提尔(Geoffrey Till)认为,现代/竞争型和后现代/合作型两种模式存在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海军建设中。^④ 纽金特(Nugent)指出,越南海军发展反映了大舰海军(“big ship” navy)和近岸海军的融合化和均衡化趋势。^⑤ 在对越南“对冲战略”的研究中,学者们揭示了越南海上力量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提升制海能力和威慑能力不断扩张海军规模,但在实施军事制衡的同时也避免发生冲突。^⑥

关于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的原因,学者们一般强调其作为国家海洋战略的工具,被用于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⑦ 研究者们强调越南与中国在争端中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越南占据中国的岛礁最多,争议的海域面积最大,但自身实力却与中国有巨大的差距。这导致越南担

忧中国将以强制手段夺回被占岛礁,坚定了越南发展海上力量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

从上面的观点中可以发现,有关越南海上力量的现状和发展模式有较为详尽的考察,在研究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对预判越南海军发展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有重要意义。但是,本文认为,有关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动因的分析并不全面。目前基于“不对称”实力关系进行的解释,是将不平等的实力分配作为结构原因,认为其引发了越南对中国滥用实力实施“侵略性”扩张政策的担忧。正是这种错误认知加剧了越南的“过度制衡”行为。然而,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揭示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相互误解还受到心理互动过程的左右。^⑧ 对于中越关系来说,结构

① Carl Thayer, “Can Vietnam’s Maritime Strategy Counter China?” *The Diplomat*, Sept. 29,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9/can-vietnams-maritime-strategy-counter-china/>.

② Jack McCaffrie, “Submarines for South-east Asia: A Major Step?” in Geoffrey Till and Jane Chan, eds.,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4, pp.29-52.

③ Jan Joel Anderson, “Submarine Capabilities and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36, No.3, 2015, pp.473-497.

④ Geoffrey Till and Jane Chan, “Introduction: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in Geoffrey Till and Jane Chan, eds.,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4, pp.3-15.

⑤ Bob Nugent, “Naval Acquisition Trends in Asia” in Geoffrey Till and Jane Chan, eds.,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4, pp.15-29.

⑥ 这里的“对冲战略”是指东南亚小国对大国实施的一种融合对抗/制衡与合作/追随的策略组合,旨在利用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的同时,防范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参见: Le Hong Hiep,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3, 2013, p.344; 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 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3, 2014, pp.334-336.

⑦ Geoffrey Till and Jane Chan, eds., *Naval Moder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Nature, Cause and Consequences*,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4, pp.124-126, 36; James Goldrick and Jack McCaffrie, *Navies of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y*,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3, p. 204; Sheryn Lee, *Crowded Waters: Naval Compet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SP1: Special Report, 2015, p.7.

⑧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0页。

因素并不是导致越南错误认知和过度制衡的唯一重要原因。我们需要依据认知理论进一步探究越南增强海军力量的心理因素。

此外,海权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海军扩展不仅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执行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实现国家利益,并与内外环境进行复杂互动的历史过程,海军扩张的实施同样包括自我延续的因素。例如,英国海军崛起总体来看是海军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的相互促进,并与欧陆国家(特别是荷兰)的政治、军事支持分不开。德国海军扩张的失败,既是因为在“无畏舰”竞赛中被英国压倒,引发了本国对发展海军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争论,也是因为海权竞争引发英国敌意,促使其下决心改变与法俄的敌对,通过构建三国协约与德对抗。这无疑反映出大陆强国海洋转型受到地缘战略环境的根本限制。执行层次上的收益激励和战略环境反馈同样对一国海上力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构成国家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动因。

由此,本文认为,对于国家海上力量建设动因的分析至少涉及两个层次:认知和执行。认知是指对利益受到威胁的共识,反映的是各种要素对于威胁建构的影响机理。执行则是指海上力量扩张的实践过程,包含收益激励和战略环境反馈两方面内容。收益激励是指海上力量只有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工具,成为国际斗争的有力手段,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谓的国际战略环境则包括:(1)地缘政治环境,也就是大国对一国海上力量建设的态度。(2)经济发展环境,即增强国力国势的对外经济合作情势。国际战略环境的反馈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的反馈是海上力量发展在得到大国支持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经济合作。消极的反馈则是指海上力量的发展受到大国制衡并对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有制约作用。只有国际战略环境出现积极反馈,或避免消极反馈,海上力量才能积聚加速扩张的动力。

越南海上力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样涉及这两个因素:在认知上,实力的“不对称性”对越南的威胁认知有重大影响,但并不构成唯一重要的

因素。在“不对称性”之外,中越之间的历史记忆对于强化越南威胁认知同样有重大作用;在执行中,越南海上力量逐渐形成了有限的威慑能力,成为实现海洋权益的有力工具,并在受到地缘政治环境正反馈的同时,避免经济发展环境出现消极反馈。“不对称性”作为一种影响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影响一国的威胁认知过程发挥作用。进一步理解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的动因,需要更加全面地分析认知和执行两个层次上的要素。因此,本文下面在概览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特征的基础上,重点从认知和执行两个层次来分析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的动力机制。

二、越南海上力量发展

进入21世纪,越南确立并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将海上备战作为基本的国防任务。根据“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越南2010年前的军事战略》(2003)、《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2007),以及若干从近期到远期的海军发展规划,越南海上力量着力建设以海军为核心,以岛礁为支轴的立体防御体系,稳步形成三层防御岛链;同时,向一支具有地区行动能力的海上力量转型,逐渐具备远海护航能力和作战能力(包括威胁中国南海战略航道的能力),谋求在局部争端海域的相对优势。^①其海上力量在短短十余年内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并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首先,投入规模大幅增加。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越南军费支出也相应扩大,其对海上力量的投入也水涨船高,军费增长幅度一度跃居东南亚南海争端国的首位。从2005年至2016年的12年间,越南军费开支从18.1亿美元增长至50.1亿美元,增长约1.8倍。^②在同一时期,印尼作为东南亚南海争端方的头号军事大国,其军费从30亿

^① 参见成汉平著:《越南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106-107、119-120、234-238页。

^②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in Constant (2015) US \$ m., 1988—201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2015-USD.pdf>.

美元增长至77.8亿美元,增长约1.6倍;对华一度最为强硬的菲律宾的军费支出,只是从25亿美元增长至39.9亿美元,增幅约为0.6倍;马来西亚则从39亿美元增长至43亿美元,增长约0.1倍^①。如果从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2009年算起,越南在这段时间(2009—2016年)内的军费支出增长1.7倍,^②特别是从2010年至2014年,越南军费增长达到59.1%,居东南亚各国之首。^③根据简氏防务周刊专家的预测,越南军费开支有望在2020年达到62亿美元。^④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越南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高位状态。从2007年起,越南军费开支就连年占据GDP的2%以上。反观印尼,其军费开支在这段时间(2007—2016年)从未达到GDP的1%,而马来西亚的军费开支则从2007年占GDP 2.1%的最高位不断下降,进入2010年后仅仅在1.5%上下浮动。至于菲律宾,其军费开支在2007年后从未超过GDP的1.5%。越南显然将更大比例的国民财富用于海上力量建设上。^⑤

不断扩大的军事投资主要被越南用来购买先进的海军装备。从目前来看,越南军费支出的总体规模依然较小。以2014年为例,越南占东盟军费总开支的11%,马来西亚占据了13%,印尼则占有18%的份额。^⑥但是,越南在海军力量发展上却不吝投入。从2011年至2015年,越南武器采购增长了近7倍,在2015年的世界武器进口国中排名第8。^⑦以2009年后的军购为例,越南共计投入约45亿美元装备了6艘“基洛”级潜艇(约32亿)、4艘“猎豹”级护卫舰(约6亿)、2艘“西格玛”级护卫舰(约6.7亿)。^⑧印尼投入约15亿美元购买了3艘潜艇和2艘“西格玛”级护卫舰。^⑨马来西亚则为其6艘“追风”级护卫舰付出了约30亿美元。^⑩可见,越南正在将较快增长的军费中的较大比例用于海军发展。

在准军事力量建设方面,越南政府投入巨大资源扩建海岸警备队。2014年,越南投入了7.5亿美元用于海岸警备队的发展,并从日本、美国大量贷款购买巡逻舰。例如,从2012年至2015年底,越南已拥有或正在建造的DN-2000型巡逻舰多达4艘。该型舰船较远的巡航距离

和较强的自持能力,以及隐身和携带撞角的设计,大幅提升了越南海事执法部门的远洋行动能力。^⑪为了提升在远海的监视、侦察和预警能力,越南海警于2003年购入2架波兰生产的M-28巡逻机,并于2008年采购了3架CASA-

①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in Constant (2015) US \$ m., 1988—201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constant-2015-USD.pdf>.

② 同①。

③ Zachary Abuza, “Analyzing Southeast Asia’s Military Expenditur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7, 2015, <https://www.cogitasia.com/analyzing-southeast-asias-military-expenditures/>.

④ Sophia Yan, “Vietnam’s Defense Spending Is \$5 Billion and Rising Fast”, CNN, May. 23, 2016, <http://money.cnn.com/2016/05/23/news/vietnam-military-spending/index.html>.

⑤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as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03—201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ex-share-of-GDP.pdf>.

⑥ 同③。

⑦ Prashanth Parameswaran, “Vietnam Now World’s Eighth Largest Arms Importer”, *The Diplomat*, Feb. 23,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2/vietnam-now-worlds-eighth-largest-arms-importer/>.

⑧ 关于越南购买“基洛”级潜艇和“西格玛”级护卫舰,请参见:Do Thanh Ha,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Security and Legalit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2017, p.164;刘亮:“越南向荷兰订购2艘轻型护卫舰,价值5亿欧元”,环球网,2013年8月26日,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3-08/4285186.html>。越南从2005年和2011年分两次从俄罗斯购买了4艘猎豹3.9级护卫舰,首次两艘该型舰的售价是3亿美元,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四艘舰共计6亿美元。参见北斗:“俄将为越南新建2艘猎豹级护卫舰2017年前交货”,环球网,2013年3月29日,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3-03/3779470.html>。

⑨ 其中,三艘潜艇约合11亿美元,参见苏强:“韩获印尼3艘潜艇订单,创韩单笔武器出口之最”,环球网,2012年2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23/c_122469878.htm。印尼曾在2012年和2013年两次订购2艘“西格玛”级10514型护卫舰,2012年首次订购的该型舰单艘造价达2.2亿美元,可以合理推测印尼为这两艘舰大约付出了4.4亿美元。参见:Pakistan Defence, “Indonesia Signs \$220 Million Contract for 1 SIGMA Destroyer Escort”, <https://defence.pk/pdf/threads/indonesia-signs-220-million-contract-for-1-sigma-destroyer-escort.185432/>.

⑩ 2012年,马来西亚从法国订购6艘追风级护卫舰,单艘造价5亿美元。“Surface Forces, Bespoke French Frigates for Malaysia”, Strategy Page, May. 4, 2013, <https://www.strategypage.com/html/htsurf/20130504.aspx>.

⑪ “Vietnam Coast Guard - Modernization”,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vietnam/marine-police-modernization.htm>;“越南海岸警卫队DN-2000型巡逻舰8005提前下水”,国防科技信息网,2015年12月4日, <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97429>.

C212-400 巡逻机。^① 后者从金兰湾起飞,监视范围可达南海中部约 700 公里的海域,这对于越南弥补信息搜集能力的短板,发展现代化的海上力量意义重大。

其次,越南海军建设以“不对称”力量为中心。从海军史的角度来理解“不对称”力量,特指可以对抗大国远洋水面舰队的水下、空中和濒海战斗平台。尽管越南的水面舰队有了重大发展,但是潜艇、导弹艇和陆基导弹的大量装备,使得越南的海军发展依然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为:

其一,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相比,越南“不对称”力量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更高。在潜艇力量方面,马印总计装备 5 艘潜艇,^②越南则于 2009 年从俄罗斯购入 6 艘“基洛”级潜艇。一国海军通常需要 4 艘潜艇才能满足从部署、训练到维护的各种不同任务。拥有 6 艘潜艇可以确保越南维持“2 艘维护、2 艘训练、2 艘战备巡航”的部署,使其可以在南海地区保持经常性的军事存在,为威慑力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规模保障。从技术上讲,越南的“基洛”级要强于中国的同型艇。在电子侦察装置、消声瓦上都采用了新技术,并获得了俄制最新型的射程达到 290 公里的 3M-14E“俱乐部”巡航导弹。先进的技术和较大的规模使得越南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水下力量。^③

在导弹艇的发展上,越南相比马印两国同样具有优势。2003 年,越南与俄罗斯签订合同引进 2 艘,并在 2010 至 2016 年根据俄方提供的技术再度建造 6 艘“闪电”级导弹艇。^④ 2014 年,越南又从俄罗斯引进了 2 艘“毒蜘蛛”级导弹艇,由此,越南新型导弹艇的总装备数量多达 10 余艘,高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先进导弹艇的总和。^⑤ 在陆基常规导弹方面,越南于 2011 年从俄罗斯接收了两个营的“堡垒-P”反舰导弹系统。^⑥ 该型系统是最先进的岸防导弹系统,具有攻击距离远(最大射程达到 300 公里)、备弹量大、机动性强、攻击速度快等优点。堡垒系统的装备,使越南在理论上有能力保卫长达 600 公里的海岸线,极大提升了越南的反介入/区域拒止

能力。此外也有消息称越南装备了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K”型巡航导弹,这型隐蔽、精准的导弹极大地提升了越南的攻陆和反舰能力。2016 年,俄印就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巡航导弹达成共识,越南有望得到这款先进的反舰导弹,从而为海军威慑增加重要筹码。^⑦

其二,马印两国不对称军备的装备规模,特别是潜艇的装备规模要远远小于水面舰队的规模。这也与越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来西亚潜艇和新购水面战舰的数量比例是 2:6,印尼的比例则是 3:6,都远低于越南 6:8 的比例。^⑧ 相比于越南将一半的军购资金投入潜艇项目,马印潜艇的投入一般只占水面舰队的 1/3 至 1/4。就先进导弹艇的装备规模而言,印尼导弹艇和新购水面战舰的数量比例是 1:2,也远低于越南的 9:8。^⑨ 这表明在各种海军军备的投入比例中,越南海军对“不对称”力量的投入比

①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People's Army,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Sultan Haji Bolkiah 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Apr. 30, 2009, pp.18-19.

② 印尼在 2012 年从韩国购买了 3 艘 209/1400 型常规潜艇,马来西亚则于 2002 年从法国订购了 2 艘鲉鱼级潜艇。

③ Franz-Stefan Gady, "Vietnam Buys Deadly New Missiles Capable of Hitting China", *The Diplomat*, Apr. 30,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4/vietnam-buys-deadly-new-missiles-capable-of-hitting-china/>.

④ "Project 1242.1 Molniya",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russia/1242.htm>; 王蕾、文成才:“越南海军发展现状以及对周边海上安全的影响”,《现代军事》,2015 年第 4 期,第 79 页。

⑤ 这里的先进导弹艇是印尼海军的 KCR-60M 型导弹艇,其吨位和性能基本可以匹敌越南的“闪电级”导弹艇。这型导弹艇的装备数量已达 3 艘。而马来西亚则未装备新型导弹艇。

⑥ 张肇瑞:“越南欲从俄购买更多超音速反舰导弹与苏 30 战机”,中国网,2014 年 7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7/22/c_126780628.htm。

⑦ Ankit Panda, "Vietnam May Purchase India's Deadly Supersonic BrahMos Cruise Missile", *The Diplomat*, Jun. 2,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6/vietnam-may-purchase-indias-deadly-supersonic-brahmos-cruise-missile/>.

⑧ 印尼已从韩国购入 3 艘潜艇,其主要水面舰艇包括:2004 年和 2006 年两次从荷兰购入的 4 艘“西格玛”级护卫舰;2010 年、2013 年再度购买 2 艘该型舰的新型号——“西格玛 10514”。马来西亚则拥有 2 艘潜艇,并从法国购入 6 艘“追风”级护卫舰。越南则购入 6 艘潜艇和 8 艘护卫舰(6 艘“猎豹”级和 2 艘“西格玛”级)。

⑨ 印尼目前拥有约 3 艘 KCR-60M 型导弹艇,6 艘先进水面战舰;越南有约 10 艘先进导弹艇和 8 艘先进水面战舰。

例也要远多于马印两国。越南的海军发展模式确实深刻地转向“不对称”型力量发展。

三、历史记忆:驱动越南海上力量建设的认知要素

作为一种硬制衡手段,海上力量发展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并对安全环境有潜在的消极影响。对于越南这样的小国来说,要以较低的经济技术水平发展针对地区头号大国的海上力量,将担负更高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因此,越南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索。有如上述,认知和执行两个层次上的因素影响了越南的海上力量建设。认知反映的是一国对于威胁的感知和评估。其作为一种被动的消极感受,反映了过往的经历、内在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利益需求,对本国遭受损害的预期。^①对威胁的感知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前者缘于对对手敌意和实力的认知,后者则包含了一种主观推论的过程,^②它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出来的效果,帮助他国建构威胁的意象。^③塑造主观威胁认知的来源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历史记忆或过去的经验、情绪焦虑等。^④据此,本文对越南威胁认知的分析,主要强调以下两点:第一,实力差距仅仅是造成威胁认知的来源之一。我们不能把越南的威胁认知以及相关的对抗行为,都归因于两国实力差距造成的战略不确定性。而是要进一步认识威胁认知的主观倾向性。第二,纵览中越关系的全局可以发现,历史记忆是主观上强化越南威胁认知的关键要素。

历史学习理论认为,威胁评估作为一种选择和加工客观材料的认知建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包袱的影响。^⑤那么,何种历史记忆会显著强化国家的威胁认知?须知“人们学得最快、最容易、最彻底的正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经验教训”。^⑥作为最重大的经验训教之一,战争及其后果因为具有震颤和普遍的效应,所以“与战争相关的经历——战前的外交活动、战争进行的方式、战时形成的联盟、战争结束的方式等——都会深刻地影响该国大多数国民的知觉

倾向。”^⑦可以说,战争记忆是一种沉重的历史包袱,那些屡次成为交战对手的国家会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中固化为威胁客体,不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情境中引发不安和恐惧。在中越两国的关系中,双边对抗、危机和战争的经验对越南的威胁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为越南强化海上力量建设提供了理由。

3.1 中越历史记忆

越南历史记忆的一大基本内容就是与中国频繁交战。在越南所谓的北属时期(公元前207年至968年),^⑧中国的郡县统治就遭受越南人的反抗。在这一时期爆发的一系列反华起义,被越南视为反侵略精神的体现,在其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被神化。在公元968年之后的朝贡交往中,越南追随华夏文明秩序的道德诉求较低,维护独立、确立统治合法性的功利诉求明显。战争成为确立朝贡体系的基本方式之一。在宋太宗(980年)、明成祖(1407年)和乾隆皇帝(1789年)时,中越两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仅元代,中越两国就三次交战。但是,在千年历史中,战争只是两国关系的插曲,和平交往才是主流。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说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互相怀有深厚的感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始终是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推动两

① David Baldwin, “Thinking about Threa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15, No.1, 1971, pp.71-78.

② Klaus Knorr, “Threat Perception”,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Kansas: Lawrence Press, 1976, pp.71-78.

③ 邱美荣:“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第5页;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pp.1-2.

④ [美]兰德尔·施韦勒著,刘丰、刘永译:《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⑤ Dan Reiter, *Crucible of Beliefs: Learning, Alliances, and World War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⑥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⑦ 同⑥,第276页。

⑧ 公元前207年,秦吏赵佗建立南越国,国土范围向南延伸至越南中南部。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标志越南独立建国。

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古代,我们两国人民密切交往、和平相处,共同推动了两国的发展。”^①但是,越南却常常以冲突和对抗来解读两国古代史。正如越南研究者所言:“我国的历史是一部反抗北方侵略的历史,但取得自主后,又要接受中国已有的行政组织。”^②在两国关系紧张时,这种误解和歪曲就更加严重。越南前总理杜梅就曾在上世纪90年代“哀伤地谈起越南悲情历史,曾经1000年同中国交战”。^③至近现代,冲突和敌意依然在中越关系中延续。先是在越南战争后期,北越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怀疑中美关系的调整将损害越南的利益。接着在越南独立后,中越两国迅速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蜕化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国不仅与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陷入对抗,而且于1974年和1988年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地区两度发生武装冲突。在1979年的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在边境上的作战断断续续达十年之久,连续的危机和战争记忆使两国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更加对立。

目前,有关中越历史关系的消极认知依然反映在越南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越南的历史教科书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有关民族英雄抗击中国封建王朝侵略的内容。^④越南教育部还考虑在教科书中增加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中国称“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下同)、西沙海战、南沙海战等内容。^⑤2015年12月,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同样敦促把西沙海战、南沙海战等历史事实写入学校教科书。^⑥越南反抗中国“入侵”的记忆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身份认知的基本组成部分,被保存在国家生活中。2016年,越南国内再度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以纪念西沙海战42周年、南沙海战28周年以及中越边境战争37周年,对冲突记忆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越南的自我观念和身份意识,其所传达的历史敌意导致军事制衡成为越南对抗中国的政策选项。

3.2 历史记忆强化越南的威胁认知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知识结构,赋予越南认知以强烈的倾向性,将越南的威胁认知置于一

个与现实完全脱节的观念框架之中。具体地说,历史记忆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影响越南的威胁认知。

一是塑造错误的角色身份,产生了有意的偏见。即一国只接受其愿意看到和接受的信息,看轻或曲解与之矛盾的信息。在双边互动中,中国一直试图通过克制和善意和平解决争端,这无疑与基于实力差距预期到的行为模式相矛盾,释放出了一种与历史经验完全不同的信号。可以说,越南仅仅是面对实力差距导致的战略不确定性,而非中国确定的扩张行为。然而,对抗性历史记忆将自身与中国划分为相互对立的敌我两类群体,越南对他者的负面观念会随之固化,很难被彻底打破或更正。社会心理学指出,“证据越弱或越模糊,倾向性的影响力越大”。^⑦因此,在敌我意向的作用下,越南倾向于将中国的意图扭曲为不确定和非善意的。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院副院长阮红军少将声称,中国的南海政策“图谋军事控制东海(即我南海)的国际航道,以阻断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欲以综合实力胁迫东盟在东海问题上让步,企图将东海纳入中国的利益范围,达到独占南海的目的”。^⑧对于中国在争端中的被动

① “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全文)”,人民网,2005年11月2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3820655.html>。

② 陈廷厚著:《自传统到现代》,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2页,转引自李春霞:“南海问题中的越南民族主义”,《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7期,第40页。

③ 李光耀著:《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页。

④ 古小松:“中越建交65周年回顾:经验与反思”,《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11月(下),第90页。

⑤ “越南考虑在历史教科书中增加中越战争等内容篇幅”,观察家网,2016年2月24日, 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02_24_352000.shtml。

⑥ “越南纪念西沙海战‘罕见高调’民间发起反华示威”,环球网,2014年1月20日,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1/4769393.html>。

⑦ Dean G. Pruitt,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as a Deter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tion”, in Herbert C. Kelman, ed.,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p.400.

⑧ [越]阮红军:“中国独占南海阴谋及东盟的对策”,《国际研究》,2015年第1期,第41-58页,转引自李春霞:“大国博弈下的越南南海策略调整:东盟化与国际化”,《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92页。

防御倾向,越南有选择地负面解读或予以忽视。越南将中国的“反应性强硬”歪曲为“切香肠”式的修正主义行为,^①中国的合作和克制政策也陷入失能状态,无法有效削减两国的信任赤字。

二是强化了对中国维权的“不对等关注”。在国家间实力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对抗性记忆将强化弱国对强国的“不对等关注”,引发针对强国的过激反应。^② 这里的“不对等关注”是指,相比于大国关注对等大国而忽视小国,小国原本就会高度重视、过度解读大国的一举一动。在形成敌我角色的错误认知后,“不对等”关注会更加严重,小国倾向于认为敌对行为非常频繁且造成重大、迫在眉睫的损失,以至于夸大了大国造成的威胁。由于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差距,越南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积极维权一直给予过度关注。例如,越南《人民报》自2009年以来对南海问题的声明次数就直线上升。^③ 相关报道,特别是负面报道的总量远多于中国同类媒体。^④ 随着对抗性历史记忆错误地将中国置于越南国家利益的对立面,越南对中国维权的担忧相应增加,越南前总理阮晋勇就声称越南面对两大威胁,“一方面是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破坏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对海岛和国家主权的威胁与侵犯”。^⑤ 这无疑夸大了中国南海政策造成的威胁,对于两国关系的对抗性做出了过度悲观的估计。

三是提出了维护本体安全的诉求,强化了对华威胁认知。在对抗性记忆的历史叙事和解释框架中,无不将自身塑造成抵抗外部强制的反抗者,由此导致国家出于维护本体安全的目的来处理对华关系。所谓本体安全,就是维护身份稳定的安全。^⑥ 在布伦特·斯蒂尔(Brent Steele)看来,形成本体安全的机理是“自传体叙述”,亦即在国家生活中将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建构成一个统一意象。^⑦ 经由“自传体叙述”催生的本体安全,会产生一种保持话语和实践连贯性的压力,促使国家政策与自身身份相一致。因此,在争端发生时,越南将认为中国的立场挑战了自身的本体安全,对自身有尊严,有价值的身份认

同构成了威胁。“981”事件中,越南国会主席张晋创引用《大越史记全书》中黎圣宗皇帝的话来表明立场:“我尺山寸河岂宜抛弃?汝敢以太祖尺地寸土谗贼,罪显诛夷”,^⑧反映出在本体安全威胁下,越南坚持对抗的态度。而塑造和维系一种连续、完整、有内聚力的集体身份则是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对于本体安全的挑战也几乎必定威胁一国政府的合法性。在爱国主义鼓动民意的情况下,政府内的理性决策者也受到合法化压力,倾向于接受对抗性的认知模式。在“981”事件中,越共领导层中的多数人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包括总理和国会主席在内的十名政治局委员主张谴责中国,诉诸强硬对抗政策。^⑨ 事实上,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离开了对抗性历史记忆带来的荣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越南显然难以建成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海上力量。

由此,在对抗性历史记忆的作用下,决策者通常会以类比的方式认为“上一次战争的原因

① Robert Farley, “A Holiday Primer on Salami Slicing: How to Approach the Complex Problem of Salami Slic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Dec. 26,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12/a-holiday-primer-on-salami-slicing/>.

② 参见: Brantly Womack, “How Size Matter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 *Strategic Studies*, Vol. 24, No. 4, 2001, pp. 123-150; Brantly Womack, “Asymmetry and Systemic Misperception: China, Vietnam and Cambodia during the 1970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2, 2003, pp. 92-119.

③ 李春霞:“越南官方媒体的中国认知变迁分析——以越南《人民报》(2000—2011)为样本”,《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08页。

④ 韦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舆论宣传策略”,《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4期,第44-45页。

⑤ 李春霞:“南海问题中的越南民族主义”,《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7期,第42页。

⑥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⑦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3.

⑧ “国家主席张晋创:对每一个越南人而言,国家独立主权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越通社,2014年6月20日,<http://cn.vietnamplus.vn/Home/%E.../20146/37147.vnplus>.

⑨ Carl Thayer, “Vietnam, China and the Oil Rig Crisis: Who Blinkled?” *The Diplomat*, Aug. 4,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8/vietnam-china-and-the-oil-rig-crisis-who-blinkled/>.

也可能是下一次战争的原因”。^① 越南倾向于认为“几百年来在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很可能随时再现”。^② 在中越争端加剧的背景下,不乏学者认为争端“唤起并加剧了将中国视为扩张性和侵略性强权的传统观念”^③,越南将中国的南海维权建构为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威胁。^④ 由此,在2001年越共“九大”召开以后,越南制订了面向新时期“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改变过去战略部署上的“北重南大中间轻”的态势,提出了“陆缩海进”的军事战略,^⑤随之拉开了大规模海防建设的序幕。2003年4月,越南国防部制订了《越南2010年前的军事战略》,对当前的战争能力予以评估,再度调整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其中重点提及了应对海上武装冲突的方法。^⑥ 在海军建设方面,越南先后制定了《2000年海军武器装备发展计划》和《21世纪海军发展规划》,强化武器装备研制和引进力度,完成防卫南海的基本兵力体系建设,并逐渐具备远海独立作战能力。^⑦ 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越南声称迫切需要更新现代化武器装备来履行保护主权和海洋利益的职责。随后,越南通过购入“基洛”级潜艇和现代化水面舰艇,将海上力量发展带入远海作战的新阶段。

四、收益激励与环境反馈:越南海上力量发展中的执行要素

执行过程的突出特点是海上力量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并引发国际体系的反馈。我们可以预见,越南海上力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既定利益诉求的逐步实现,以及国际战略环境的激励。所以本文下面要解决的问题是,海上力量在实现越南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其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受到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反馈? 其是否可以借由亚太战略环境变革积聚的势能取得持续扩张的条件?

4.1 海上力量成为维护越南海洋权益的主要手段

首先,作为海洋利益扩张的有力工具,越南海警力量已成为对抗中国海警、渔政等非军事

力量的“急先锋”,作为海上“全民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渔业管理、对抗中国执法维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次,越南海军在拓展海洋利益的过程中愈发重要。其原因在于越南海军可以在执法冲突或有限的武装冲突中制衡中国海军优势,成为实现海洋权益的核心手段。

就中越两国的冲突情境而言,必须要强调的是全面战争受到两国实力差距、经济交往、制度化互动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很难爆发。《越南2010年前的军事战略》就强调“我们未提及全面的海上作战,主要是对海岛防御作战的作战形式和类型进行研究”。^⑧ 由此表明大规模武装冲突并非维护越南海洋权益的適切方式。^⑨ 但是,相比于全面的海上作战。2010年后两国间反复的对抗却表明,执法冲突和危机可能愈演愈烈,进而引爆两国间的有限武装冲突。在相关冲突情境中,越南海军可以发挥最大化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小化冲突风险的作用:一是有如2011年的“5·26”撞船事件和2014年的“981”钻井平台事件表明的,越南海军在执法冲突中被用作情报搜集和预警的节点,为越南当局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并对突发事件进行快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② 这是2009年越南外交学院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邓庭贵在“越中边界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所提及的,见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143页。

③ Le Hong Hiep,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5, No.3, 2013, p.340.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tirring up the South China Sea (II): Regional Responses*,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229*, Jul. 24, 2012, p.3.

⑤ 陈继章著:《越南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转引自成汉平:“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及我对策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5期,第16页。

⑥ 成汉平著:《越南海洋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5页。

⑦ 张忆南、曹扬:“透视越南的海空力量建设”,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8月15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419935.html>。

⑧ 同⑥,第81页。

⑨ 也可参见:Carl Thayer, “Can Vietnam’s Maritime Strategy Counter China?” *The Diplomat*, Sept. 29,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9/can-vietnams-maritime-strategy-counter-china/>; Ankit Panda, “Vietnam’s China Challenge: Making Asymmetric Deterrence Work”, *The Diplomat*, Sept. 9,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9/vietnams-china-challenge-making-asymmetric-deterrence-work/>。

速反应,抢占应对争端的先机。通过在争端海域维持军事存在,越南可以向对方释放强有力的对抗信号,宣示权利。与此同时,展示海军实力也可以向国内外表明对抗决心,在威慑、限制中国海军积极干预争端的同时,吸引第三方(特别是域外大国)的支持。通过运用海上力量,越南在维权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与中国进行直接对抗,大幅增强了越南维权的决心、力度和灵活性。二是作为全民海防体系中的关键部分,在执法冲突升级为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坚持高强度对抗,避免越南遭受重大军事灾难。其方式是争夺或维持有限时间和局部地区的制海权,尽量限制中国海军进入关键海域,及其自由利用海洋的能力。因为中越海上力量差距悬殊,与中国进行高强度对抗有着极高的战略风险,是越南“难以承受之重”,所以通过低强度对抗参与或支持执法冲突,将是越南海军挑战中国海洋权益的首要方式。

那么,越南海军的发展能否适应其维权需要?众多学者基于地理和军力运用相互关联的视角,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具体地说,其原因有三:首先,地理环境有利于越南。越南距离争端海域较近,享地利之便,可以在邻近地区投送兵力,而中国的维权行动必然要克服距离带来的“力量损失梯度”,这一近一远就带来了力量上的此长彼消。就空间结构而言,南海作为半闭海有逼仄、复杂的特点,不利于大国水面舰队机动,但越南却可以充分利用海岸和近海岛屿发挥“空潜快”平台的优势,从而极大增加中国军力运用的复杂性和风险。其次,从“硬件”上看,由陆基和海基导弹、“苏霍伊”战机和“基洛”级潜艇打造的海上力量体系,使越南具有在专属经济区内遂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①再次,从“软件”上看,通过自主作为和对外合作,越南海军正在不断积累兵力运用经验,倾力打造海上信息体系。防务分析家向来对越南海军的训练和信息化水平多有诟病,并视此为阻碍海军威慑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②但是,通过自主引进由波兰制造的“黎贵惇”号风帆训练舰,发展无人机和地球遥感卫星,越南已对人员培训和海洋感知能力建设进行了深远布局。^③

在对外合作方面,越南不仅已经获得了俄罗斯海军的舰船和火力,而且正在获得印度的潜艇战技能和地球遥感卫星技术。^④并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融入地区海洋信息体系。特别是伴随美国解除对越军售,越南海军信息化的最大短板——预警能力的缺乏,也有望通过引进P-3反潜巡逻机得到快速弥补。一个广泛的国际军事合作网络正在成为越南海军信息化建设的“温床”,引导越南成长为有潜力的新军事革命学习者。

4.2 地缘政治环境的正反馈:不断深入的美越海上安全合作

地缘政治环境对于越南发展海上力量至关重要。其原因在于海军的建设通常可以显著影响地区均势,必然挑动大国的敏感神经,引发大国的深度关注。而这将反过来影响该国海军建设的外部环境。越南海上力量尽管缺乏影响地区均势的战略重要性,但因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南海争端中的激进立场,依然被大国视为地缘棋局中的潜在支轴。如果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对于越南海上力量的发展持支持态度,那么越南海上力量就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在共同的对华疑惧的作用下,越南海军的现代化正受到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大力支持。两国的海上合作已经是建立双边互信、打造新型安全伙伴关系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看,两国加强海上力量合作包括以下

① Robert Farley, “If Vietnam and China Went to War: Five Weapons Beijing Should Fe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 12,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f-vietnam-china-went-war-five-weapons-beijing-should-fear-10861>.

② Zachary Abuza, “Vietnam’s Naval Upgrades Likely Will Limit But Not Deter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 12, 2014, <https://www.cogitasia.com/vietnams-naval-upgrades-likely-will-limit-but-not-deter-china-in-the-south-china-sea/>.

③ Koh Swee Lean Collin, “Vietnam’s Master Plan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Feb. 4,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2/vietnams-master-plan-for-the-south-china-sea>.

④ 主要的事件包括:2013年,印度宣布对越南500名潜艇人员进行水下作战训练。2016年,印度在越南南部建立一个卫星追踪和成像中心,越南将不必经过印度允许直接接收遥感图像,借此侦察中国沿岸的海军基地、南沙岛礁上的海军动向。

重要环节;从2008年至2010年,海洋安全合作和海军互信被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两国“政治、安全和防务”对话和“防务政策对话”中;2011年,美越签署了有关加强两国国防合作的备忘录,海上安全被确立为5个合作领域之一;2013年,两国海岸警备队一致同意保持沟通并加强在航海自由、海洋安全以及地区安全制度构建等方面的合作,确立了海洋防务领域的合作纲领;^①2015年,越美签署《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进一步把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引向深入。

在美越安全合作升温的过程中,海军装备革新发展是合作的基本内容。越南深知武器进口来源单一化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风险,因此一直推动武器进口渠道的多元化。在购入俄罗斯武器的同时,越南也常年与西方军工企业接触,寻求购买欧美先进战斗机、海洋巡逻机等武器装备。在奥巴马访越之前,越南就举办了由美国顶尖武器制造商参加的座谈会,以促进越南官员与美国防务企业的合作。^②2010年美越军事合作趋于制度化之后,海军装备合作更是被视为深化双边军事伙伴关系的一个有力抓手。随着2015年美越《远景声明》的出台,加强两国军备合作已经势在必行。2016年,奥巴马访越给两国关系献上大礼——解除对越军售的限制。此举随即即为未来两国深化海军合作铺平了道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就说,一旦取消对越军售限制,美国海军就可以帮助越南快速提升海军实力。^③

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支持越南加强海洋能力建设。其中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 Training,以下简称IMET)和外国军事资助项目(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以下简称FMF)对包括海军在内的越南军队提供教育培训、物资和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从2010年至2016年,美国对越南IMET的援助额从40万美元增长至146万美元,FMF的援助额则从200万美元增长至1958万美元。^④其中,外界最为瞩目的是巡逻艇的援助项目。2014年,美国向越南转让4艘巡逻艇。2015年,美国又再次向越南提供1800万美

元,使其可以购买至少12艘挑战(Defiant)-75型巡逻艇。^⑤这些性能优异的巡逻艇加入越南海岸警备队,将使越南拥有更多对抗中国维权的筹码。展望未来,“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也将成为美越两国在海上力量合作方面的新抓手。^⑥该倡议作为美国实施海洋能力建设的新举措,旨在通过发展地区海洋感知能力和高级别的海军接触弥补东南亚各国C4ISR体系上的短板,从而应对中国海权崛起带来的挑战。2016年,美国国防部向外界透露正在准备实施该倡议。越南海上力量作为东南亚海洋感知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也将在该倡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已决定在2016年向越南提供200万美金援助,以支持其更新巡逻舰船和飞机,以及指挥、控制和

① Xin Qiang, "US-Vietnam Securit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11, 2015, http://www.ciis.org.cn/english/2015-05/11/content_7894319.htm.

② My Pham and Idrees Ali, "Quietly, Vietnam Hosts Arms Gathering Attended by U.S. Companies", Reuters, May. 11,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usa-arms-idUSKCN0Y21EK>.

③ “美可能解禁对越军售”,解放日报网,2014年8月17日,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th/html/2014-08/17/content_5871.htm.

④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Defense Historical Facts Book", Defense Department of U.S., Sept. 30, 2015, http://www.dscs.mil/sites/default/files/historical_facts_book_-_30_september_2015.pdf.

⑤ “美国送越南1800万美元购买至少12艘巡逻艇”,中国青年网,2015年6月12日, http://news.youth.cn/js/201506/t20150612_6745455.htm.

⑥ 该倡议是在2015年6月的香格里拉峰会上,由时任美国防长阿什·卡特向外界公布。2016年4月,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实施该倡议的通知后,开始正式实施这一倡议。尽管该倡议的细节尚未向外界透露,但是其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通过发展海洋区域感知能力、扩大联合训练以及进行高级接触等方式,推动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海洋能力建设。与之前美国对东南亚国家海洋能力建设的支持相比,该倡议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在发展海洋感知能力。即帮助相关国家发展侦察、认知和共享南海海空活动信息的能力。为此,美国需要在信息装备发展、人员训练和军事设施建设等方面对相关国家进行资助。预计截止到2020年,美国对此项目的拨款总额将达到4亿2千多万美元。参见:Prashanth Parameswaran, "America's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Apr. 2,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4/americas-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 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Kicks off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Apr. 10,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4/us-kicks-off-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

通讯系统。^①从2017年至2020年,美国预计将逐年增加对于“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的拨款,^②对于越南海上ISR(情报侦察监视)系统的援助也会水涨船高。这表明美国在越南海洋军事发展中正在发挥重要的支持和建设性作用。借助美越合作的战略机遇,越南海上力量已从对美合作中获得了重要红利。

4.3 避免经济发展环境的消极反馈:持续拓展中越经济合作

中越争端有一项特殊情势:越南在制衡中国的同时,也以中国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就需要思考中越经济发展与越南海上力量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越南来说,经济发展是最为核心的国内任务。海上力量的发展不应以损失对华经济合作为代价。维持对华正常经济交往是扩展海上力量的必要条件。而在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条件下,越南的这一诉求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虽然越南的海上力量扩张不可避免地对南海维权造成消极影响,但是中国在争端中的合作、克制政策维护了两国和平稳定的大局,避免海上力量竞争实质损害两国合作关系。

首先,中国坚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双边关系与南海争端的“松绑”。中国确立和坚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定位,不使争端破坏中越友好合作的大局。例如,2013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确认“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妥善处理出现的问题,不使其影响中越关系大局以及南海和平稳定”。^③2015年,两国再次强调“维护中越关系大局和南海和平稳定”。双边经济互利合作正是两国关系的大局之一。从2000年至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从仅有约24亿美元增长至近960亿美元。^④早在2013年,对华贸易额就超过越南贸易总额的19%。^⑤至2015年,中国连续12年成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越南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对华经济合作已成为越南实现经济繁荣的关键依托,对越共政权稳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由于中国的和平合作政策,中越双边

的海洋军事竞争可以被有效管控,极大地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确立“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方针,中国主动推进争端方互利友好合作,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新思路;通过不断强化双边政党和政府间的制度联系,适时与越方加强沟通弥合分歧,中国把控两国关系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通过将“黄岩岛模式”运用于南海维权,在发挥海军威慑作用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运用准军事和民事执法力量进行维权,大幅降低了争端的烈度以及武装冲突的风险。^⑥中国实施的一整套管控争端的具体政策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越南海上力量发展而加剧的安全紧张。

这一将经济互利、制度交往和认知建构结合起来的政策体系,可以说是中越两国“成熟不对称”关系的深度优化,^⑦内含一项自由主义国

① 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Kicks off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Apr. 10,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4/us-kicks-off-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

② 美国2016年已拨款4972万美元,其中总额的85%,共计4100万美元被用于支援菲律宾的海洋能力建设。2017年,美国预计拨款7500万美元。从2018年至2020年,美国计划每年拨款1亿美元。目前,尚无资料表明特朗普政府要削减这一拨款。参见: Prashanth Parameswaran, “America’s New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Apr. 2,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04/americas-new-maritime-security-initiative-for-southeast-asia/>.

③ “中越联合声明(全文)”,新华网,2013年6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1/c_116238537.htm。

④ “中越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2年2月28日,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0207/20020700023640.html>; “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近960亿美元”,环球网,2016年1月20日,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6-01/8414387.html>。

⑤ Young-Chan Kim, *Chines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ASEA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6, p.203.

⑥ 关于所谓的“黄岩岛模式”,可以视之为中国维护黄岩岛主权措施总和的概称。参见曾勇:“从黄岩岛模式看中国南海政策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第132-134页;张洁:“黄岩岛模式与中国海洋维权政策的转向”,《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28页。

⑦ “成熟不对称”关系是美国学者布兰特·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概念。沃马克认为,中越之间有基于巨大的实力差距而来的不对称性,但是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两国的“敌对不对称”关系,中越自关系正常化以来逐渐形成了“成熟不对称”关系。这一关系的特点是通过相互学习和适应使彼此形成了稳定的预期。通过高层互访、搁置争端或形成惯例等方式,中国可以预期得到越南的尊重,而越南则可以确保自主性。参见: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6.

际战略的根本逻辑:从近期来看,两国出于维护经济合作的共同利益,借助双边制度框架管控争端;从长期来看,共同利益和制度化互信将渐进改变两国的身份认知,强化认同感,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前提条件。这一战略的优点在于最大限度地汇聚和利用两国关系中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从而维护中国发展的和平环境,然而,其缺点在于难以遏制越南海上力量的扩张,连同其导致和加剧的安全紧张。因此在21世纪,越南海权扩张与中越经济合作并行前进。即便是981钻井平台事件也没有遏制两国经贸合作的势头,两国贸易在2014年达到836.4亿美元,提前实现双方领导人确定的至2015年双边贸易600亿美元的目标。^①至201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960亿美元,甚至困扰两国贸易的不平衡问题都有所缓解。2015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364亿美元,一年减少74亿美元。^②相应地,越南的GDP增长6.68%,创8年来新高,近2000亿美元。^③中国坚持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在越南的过度制衡面前保持了充分的克制,避免海上力量成为一个影响双边关系的尖锐、突出的战略话题。越南也借此可以同中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合作,并大力发展自身的海上力量。

五、结 语

本文认为,海上力量大规模的持续扩张,是认知和执行两个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威胁认知、海上力量的作用和国际环境反馈多个方面认识了越南扩张海上力量的动力机制。从威胁认知来看,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历史经验加剧的威胁感和武力偏执对冲经济交往和制度互信,是塑造国家战略行为的一个常在机理。作为这一机理在南海争端中的具体表现,历史记忆对越南强化威胁认知,扩张海上力量同样发挥了重要的观念建构作用。在执行的过程中,尽管两国海上力量规模差距巨大,但在执法冲突、危机或有限武装冲突的情境下,越南海上力量依然可以发挥威慑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国南海维权。在中国崛起的条件

下,中美两国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会继续通过干预南海问题与中国角力。或者说,在南海争端当事国试图制衡中国的条件下,美国很难主动放弃对越南的支持。

概因经济交往对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有根本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战略更加重视提升中越经济联系造成的政治、战略收益。尽管越南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远远大于中国,但中国依然不愿意通过施加经济制裁迫使其在争端中让步。特别是在两国海军实力差距巨大,越南需要规避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将更加重视削弱中越经济联系造成的成本而非收益。运用经济强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西南省份的经济和对越投资企业造成冲击,因而具有潜在的经济代价,更重要的是它将削弱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不利于最终和平解决争端。事实上,在对外战略史上,中国实施经济强制的频度和强度非常之低,通常只是针对有限外交目标施加相对有限的制裁,对旨在扩展安全利益的大规模、高强度经济制裁向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④中国始终倾向于将双边经济发展大局与南海争端分开处理,通过保持克制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越南因此得以在避免经济发展环境出现消极反馈的情况下发展海上力量。

总而言之,正是从认知到执行中各个要素的作用,使得越南通过扩张海上力量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了过度的制衡,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海上力量成为越南最大化其南海利益的战略工具,但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对中国维权造成的消极影响依然相对有限。中国通过保持和运

^① “商务部:中越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上半年增16.6%”,中国经济网,2015年7月21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507/21/t20150721_5996032.shtml。

^② “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近960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6年1月20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j/201601/20160101238386.shtml>。

^③ “2015年越南经济十大亮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6年1月5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j/201601/20160101226715.shtml>。

^④ Tong Zhao, “Sanction Experience and Sanction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Chinese Perception and Behavior on Economic Sanctions”,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16, No.3, 2010, pp.263-278.

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海上力量,依然可以在军事或准军事对抗中有效维护自身的海洋利益。从整体规模来说,中国军费支出已高于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总和,^①经过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10年以来海军兵力的扩展,中国海军舰船(艇)总规模已超过300艘,^②在西太平洋地区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从性能和质量来看,随着近来052D和055型导弹驱逐舰,以及国产第二艘航母的下水,中国海军舰船制造已经逐步走完了过渡期,可以自主生产媲美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力战舰。尽管越南可以从俄罗斯,甚至美国购入先进武器,但其也仅能在小型武器平台上维持一定的技术均衡。最后,中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陆域吹填工程,构建了支撑中国维权的坚强堡垒,强化了中国海空军的

跨海投送能力,提升了我军在南海边缘地带的军事存在,越南长期以来倚之对抗中国的地理邻近优势也将被大幅削弱。规模、技术和地理上的优势,也使得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军力对比趋于平衡,中国在南海南部不断增长的区域拒止能力,可以有效遏止美越接近对我国利益造成的损害。可以说,越南为其海上力量投入了巨量国家资源,但其扩张对南海海洋利益的真实价值依然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有效性和威慑作用还将进一步降低。展望未来,只有在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管控分歧进而寻求和平解决争端,才是越南的理性选择。

编辑 李亚

The Cognition of Threat and Incentives in Execution: Dual Motivations for Vietnam to Strengthen Sea Power

LI Dalu¹

(1.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analyses on motivations of Vietnam's maritime power development after the cold war are not comprehensive, which should be fully expla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wo factors: 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t the cognitive level, the historical memor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has strengthened the Vietnamese cognition of threat, pushing Vietnam to exercise restraints upon China in resorting to the expansion of sea power. Based on incentives in execution, Vietnamese maritime forces can play a deterrent role in law enforcement conflicts, crises or limited armed conflicts, with the aim to confront China's protection of maritim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t the same time, Vietnam's maritime power development is also inspi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s a result of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restraint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s maritime power gains positive feedback of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avoids negative feedback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aforementioned motivations provid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Vietnam's maritime power.

Key words: sea power; historical memory; Vietnam

^①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in Constant (2015) US \$ m., 1988—201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Millex-constant-2015-USD.pdf>.

^②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May.15, 2017, p.24.